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控制

——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

张宗平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过程存在着剧烈的周期性的波动。这种贯穿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双重经济体制时期的剧烈波动,不仅降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恶化了经济环境,阻碍了改革进程。因此,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寻求其控制的思路和力度,以弱化其波动的幅度,实现相对稳定的增长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与控制

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波动。从我国已经历的7次完整的经济周期来看,几乎每次经济收缩都是实行经济调整政策的结果。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大跃进”的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洋跃进”的调整,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提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八字方针。同样,每次经济扩张也都是实行经济扩张政策的结果,这可显见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性膨胀。

但经济政策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周期性波动,经济政策影响着经济运行的走向,而又决定于经济运行的现实,实际上,政策波动乃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反映。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矛盾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总量矛盾,二是结构矛盾。二者都是导致经济波动、包括政策波动的直接原因。但在不同的波期,其作用效果不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下,其表现形式各异。

经济的过份扩张依赖于总需求膨胀的拉动作用。在1978年以前,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低消费的政策,消费的增长速度较慢,稳定性较强,相对于总供给来说的总需求膨胀主要表现为投资需求的膨

胀;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有计划地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平均消费水平增长很快,总需求膨胀亦表现为投资与消费的双重膨胀。投资本身即扩大需求,又增加供给,由于时滞的存在,总是扩大需求在前,增加供给在后。这样,如果投资增长过快,就会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大供需缺口,而经济增长又会刺激起更大的需求,从而形成需求膨胀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推动。现实表明,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所保留是十分困难的。

经济收缩则是供求矛盾激化的结果。总量矛盾在传统体制下表现为物资的普遍短缺,“配给制”既是消费品的普遍短缺的产物;在双重体制下则表现为较高的通货膨胀,即物价持续全面的上涨。结构性矛盾的激化则始终表现为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发展滞后于加工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

“一五”以后,结构性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非常明显,交通运输的紧张和缺能源、缺原料的状况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对我国社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的波动周期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有7次达到波峰,社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有4次同时达到波峰,3次滞后1年达到波峰;农业总产值增长率有7次跌入波谷,社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有两次同时跌入波谷,一次滞后1年、3次滞后两年、1次滞后4年跌入波谷。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是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的激化——缓和——激化交替再现的结果,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总供求矛盾运动的过程。那么,社会总供求何以会发生周期性的矛盾运动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我们始终坚持以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使最近的一次经济调整也不是由对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警觉引发的,而是直到结构失衡和

通货膨胀达到白热程度以后才出现，二是由于旧体制的弊端还未消除，新体制的作用仍不完善，在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均缺乏投量与投向的约束机制；三是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人口多，粮食消耗量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常在保生存与求发展之间摇摆，而生产力水平低、科技落后，造成高投入、低产出，也是导致资源短缺的一个原因。

那么，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控制与治理也需从以上3个方面入手。首先，改变经济发展战略，追求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速度。实证分析的结论是，速度与效益成正相关，即速度快则效益好，速度慢则效益差。但另一个更为明显的结论是，一时的高速度必然导致剧烈的波动，有急升必有猛降，只有保持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才能带来长期的高效益，而只有长期的高效益才有真正的高速度。其次，进行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投资主体的风险责任机制和资金投量、投向的合理约束机制，此乃“治本”之策。另外，提倡节约、避免浪费，这对于缓解资源紧缺有很大潜力，同时加强技术改造，提高生产力水平，并控制人口。以上3方面只有第一条最具可操作性。要避免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激化，平抑周期波动，关键就是控制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中尤以稳住投资增长速度最为要紧。

二、“瓶颈”产业约束下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

鉴于我国“瓶颈”产业的特点，我们判断这些产业的发展状况在今后8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仍将存在。那么，这些产业能够承受多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呢？对此，我们采用动态承受的系数法予以预测。

预测模型为： $I_{it} = K_{it} \cdot Q_{it}$

其中： I_{it} 为第*i*种产业约束下第七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K_{it} 为第*i*种产业第七年的承受系数； Q_{it} 为第*i*种产业第七年的产量。

首先计算1980—1991年各产业的承受系数，列入表1。从表1可以看出，各产业的承受系数均存在着明显的趋势变动，这与技术进步和资源加工利用过程的变动及通货膨胀有关，是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为预测1992—2000年各产业的承受系数，需要建立趋势预测模型。从经济理论上考虑，如果某产业以固定增长率增长，那么该产业所能承受的投资规模也应以固定增长率增长，其承受系数也就应以固定增长率增长。这样，我们选择指数增长曲线趋势模型，利用三点法五项平均式估计参数，得预测方程为：

能源： $K_{1t} = 0.07125 \times 1.12856^t$ 。

运输： $K_{2t} = 0.07382 \times 1.0848^t$ 。

钢材： $K_{3t} = 0.29800 \times 1.10931^t$ 。

水泥： $K_{4t} = 0.10490 \times 1.06730^t$ 。

木材： $K_{5t} = 0.13490 \times 1.18267^t$ 。

粮食： $K_{6t} = 0.02120 \times 1.16585^t$ 。

表1

各产业承受系数

年 别	承 受 系 数	产 业					
		能 源	运 输	钢 材	水 泥	木 材	粮 食
1980		0.0143	0.0758	0.3354	0.1141	0.1700	0.0284
1981		0.0152	0.0791	0.2619	0.1159	0.1945	0.0296
1982		0.0184	0.0943	0.4240	0.1292	0.2348	0.0347
1983		0.0201	0.1018	0.4655	0.1321	0.2733	0.0369
1984		0.0235	0.1168	0.5436	0.1490	0.2871	0.0450
1985		0.0297	0.1403	0.6887	0.1743	0.4022	0.0671
1986		0.0343	0.1499	0.7441	0.1818	0.4644	0.0771
1987		0.0399	0.1638	0.8301	0.1955	0.5682	0.0903
1988		0.0469	0.1887	0.9590	0.2140	0.7231	0.1141
1989		0.0407	0.1617	0.8516	0.1968	0.7132	0.1015
1990		0.0428	0.1691	0.8692	0.2193	0.8243	0.1023
1991		0.0542	0.1885	0.9517	0.2129	0.9598	0.1213

表 2

资源约束下的投资与GNP增长速度预测

单位: %

	能 源	运 输	钢 材	水 泥	木 材	粮 食
各产业增长速度	4.01	8.39	7.34	10.82	0.49	2.78
1992年投资增长速度	24.9	22.4	29.5	27.4	25.1	32.0
1992年GNP增长速度	12.6	11.3	14.9	13.9	12.7	16.2
1992—2000年平均投资增长速度	18.2	18.1	20.2	19.3	19.5	21.1
1992—2000年平均GNP增长速度	9.2	9.2	10.2	9.8	9.9	10.7
各产业增长速度	3.42	7.52	7.02	9.24	-0.02	2.33
1992年投资增长速度	24.2	21.3	29.1	25.5	24.4	31.5
1992年GNP增长速度	12.3	10.8	14.7	12.9	12.4	16.0
1992—2000年平均投资增长速度	17.5	17.2	19.8	17.6	18.9	20.6
1992—2000年平均GNP增长速度	8.9	8.7	10.0	8.9	9.6	10.4

据此可预测出1992—2000年我国各产业的承受系数。需要说明的是,要准确地预测今后几年各产业的产量及运输能力(货物周转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动态承受系数模型也只对研究动态投资增长问题有效,因此,这里在如下两点假设下对各产业所能承受的投资增长速度进行预测:(结果见表2)

假设1:今后几年我国的外贸政策及各产业进出口结构基本不变。

假设2:今后几年不会再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率与1980—1991年期间的年均上涨率大体相当,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年均上涨率仍为6%左右。

表2中的GNP增长速度为可比价格,根据与投资的弹性分析得出,上栏和下栏的各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取自1981—1991年和1986—1991年的平均值。由表中数据可知,运输和能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最强,而钢材、粮食、木材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相对较弱。实际上这与在开放的系统下存在对外贸易有关,对外贸易对各产业供求状况具有不同的影响,钢材、粮食、木材3个产业的供求紧张可通过进口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而能源工业具有出口创汇的压力,运力不足和电力短缺则不能指望进口。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今后8年上述各产业的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六五”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那么在开放的系统下,199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控制在25%以内,这是能源和运输两个产业所能承受的投资增长上限;而从1992—2000年平均来看,投资增长率则应控制在18%左右。综合来看,在“瓶颈”产业的

约束下,我国近两年的投资增长速度应以控制在18—25%之间为宜。在这个基础上,重点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彻底改变结构失衡的状况,实现长期稳定协调高效的经济增长为根本。

1992年我国已进入了新的经济周期的加速发展阶段,全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均增长较快,这无疑会对国家财力和基础产业的供给能力形成巨大压力。目前的经济高速发展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可能是国民经济虽加快发展,但各方面仍保持一定的协调,经过几年的较快发展后,经济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较好的条件;另一种可能是虽然近两年内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忽视了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益,又出现盲目追求速度,一哄而上,宏观失控,经济运行在两三年内再度“过热”,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失衡,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很快进入再次调整阶段。我们要争取实现前一种较好结果,避免出现后一种不利的情况,从投资的角度讲就要求做到一要控制投资总量,二要把握投资方向。避免投资规模摊得过大,遇到国家财力约束而难以为继,将投资的着重点由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移到外延扩大与内涵扩大相结合的方面来;同时,下决心解决基础产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增加基础产业投资在投资结构中的比重,延缓或减轻运输、电力、原材料和农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从而拉长扩张期,弱化经济波动,使我国经济在90年代以提高效益和优化结构为标志,真正上一个新台阶。

(责任编辑 曾德国)